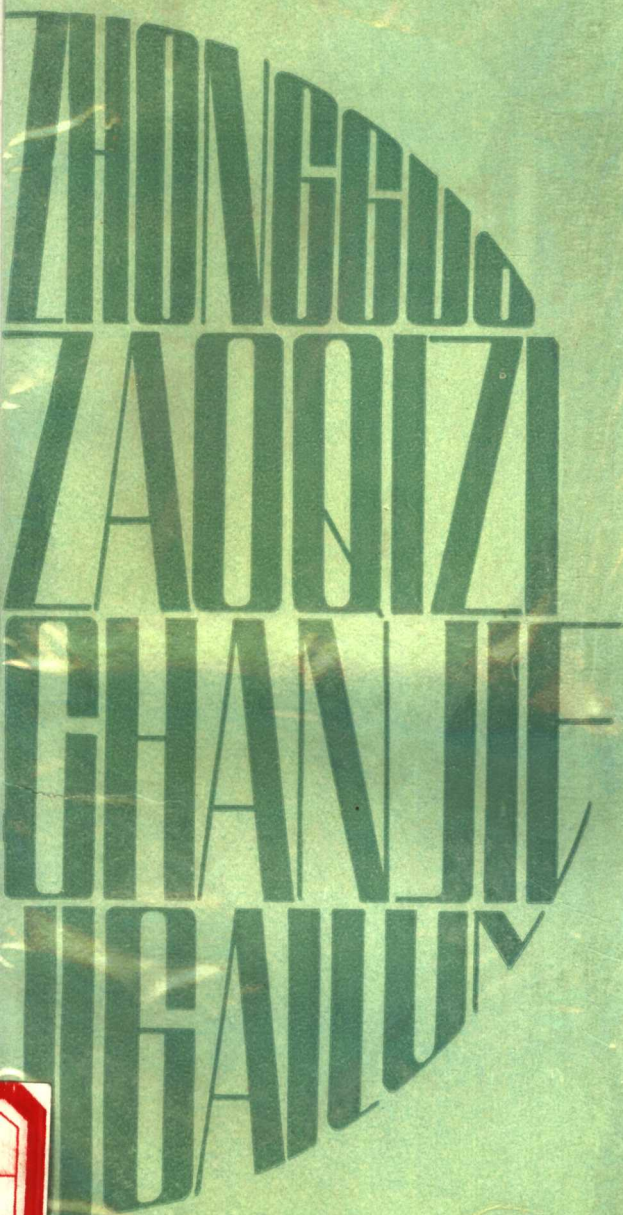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

朱英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侯惠娟
封面设计 范存江

D693.71

ISBN7-81018-781-3/D·80

定价：6.50元

(豫)新登字第09号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

朱 英 著

责任编辑 侯惠娟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封中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8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册 定价: 6.50元

ISBN 7-81018-781-3/D·80

目 录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形成·····	(1)
一 学术界有关论述评介·····	(2)
二 资产阶级组织程度的提高·····	(6)
三 资产阶级近代意识的增强·····	(11)
第二章 资产阶级的特点·····	(18)
一 独特的产生发展道路·····	(18)
二 持续过渡性特征·····	(31)
三 较强的依赖性·····	(43)
四 内部结构失调·····	(57)
第三章 资产阶级与革命派的关系·····	(63)
一 代表与被代表者严重脱节·····	(63)
二 资产阶级疏远其代表的根源·····	(71)
三 武昌起义期间的发展变化·····	(81)
四 资产阶级的错误选择·····	(93)
第四章 资产阶级与立宪派的关系·····	(105)
一 立宪派对资产阶级的争取·····	(105)
二 资产阶级对宪政的向往·····	(113)
三 参与立宪请愿运动·····	(117)
第五章 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与影响·····	(128)
一 西欧与日本等国官商关系的特点·····	(128)
二 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关系·····	(136)
三 清末官商关系的发展变化·····	(148)

第六章 资产阶级社团的兴起…………… (174)

- 一 商会…………… (174)
- 二 商团…………… (192)
- 三 地方自治团体…………… (207)
- 四 资产阶级社团的影响…………… (227)

第七章 资产阶级与反帝爱国运动…………… (236)

- 一 拒俄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237)
- 二 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 (242)
- 三 收回利权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254)

第八章 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的首次

尝试…………… (268)

- 一 拟订商法活动的发起…………… (268)
- 二 商法讨论会的召开…………… (274)
- 三 拟订商法活动的影响…………… (278)

第九章 资产阶级与“二次革命”…………… (287)

- 一 袁世凯对资产阶级的笼络…………… (287)
- 二 “二次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295)
- 三 “二次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的政治表现…………… (301)

第十章 资产阶级与护国运动…………… (312)

- 一 资产阶级与袁世凯之间的裂痕…………… (312)
- 二 资产阶级与袁世凯的决裂…………… (317)
- 三 支持护国反袁斗争…………… (323)

第十一章 苏州商会的产生与特点

——个案分析之一…………… (333)

- 一 抵制美货运动——苏州商会诞生的催化剂…………… (333)
- 二 独具特色的组织系统…………… (337)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形成

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对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探讨，理所当然是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中之尤为重要的课题。而资产阶级何时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队伍，换句话说也就是何时形成一个阶级，则是研究资产阶级首先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因此，本书将这个问题列为第一章加以分析。

海外曾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并进而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对此，国内已有学者作了多方面阐述，证实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具有一定影响，辛亥革命无疑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故本书不再赘述。^①

国内绝大部分学者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一结论均无疑义，但究竟何时形成？则众说纷纭，似无定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本章拟在分析以往有关见解的基础上，着重从组织发展程度和思想意识的变化这两个新视角，论述辛亥革命前商会的诞生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

^①可参阅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以上两文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

一 学术界有关论述评介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究竟形成于何时，迄至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随着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就已相应产生。^①持此观点的论者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说明，只是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两段话作为依据。为便于理解，将这两段话转引如下。列宁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③

上引列宁和毛泽东所说都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任何一个“阶级”，从其产生到最终形成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起初所产生的只能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成员，当其成员越来越多，并且通过自己的组织或政党，凝聚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之间有了明确的阶级认同感，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出现，才能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因此，不能将某个阶级内部成员的出现，直接说成是某个阶级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资本家的出现是比较早的。自从1840年第一次

^①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第3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列宁：《共青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2—353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0页。

鸦片战争之后，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商业，一些传统商业也逐渐向新式商业转化。那些经营新式商业的商人，可以说就是商业资本家。与传统商业向新式商业转化相伴随，一些传统商人也逐渐向近代商业资本家转化。19世纪70年代以后，又诞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了工业资本家，而且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工商业资本家出现之后，虽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尚不具备独立阶级队伍的基本特征和自觉意识，彼此没有紧密的组织联系，被隔绝分散在为数众多、互相排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之内，缺乏明确的阶级认同感。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力量也比较有限，因此在引进和移植西方机器设备，肇始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而是由国家政权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开明改革派以推行洋务运动的方式，扮演了工业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资本家只是担任了配角。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阶级形成的发展过程作过论述，前引列宁和毛泽东的两段话，实际上也指的是资产阶级内部成员即资本家的产生，并不能理解为是说资产阶级的形成。认为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即已产生的观点，直接将个别资本家的出现等同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形成，显然是将两个不同的问题相互混淆了。从目前情况看，这一观点也未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赞同。

第二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只能处于前者的附庸和助手地位，远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独立的发言权”。①

①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498—499页。

以往的有关论述，大多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充当了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时期的立宪派的阶级基础，维新派和立宪派主要代表和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与愿望。第二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主要依据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这里姑且不谈维新派和立宪派是否仅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即使承认这一点，也很难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因为这涉及到另外两个不能混淆的问题，即阶级的政治代表与阶级主体。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主体的产生发展，并非亦步亦趋，往往有超前或滞后的现象，所以也不能等同视之。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动荡频仍和各派政治力量消长急剧，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发展脱节的状况更为突出。如果单以政治代表出现，就断定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或阶层已经形成，这在政治思想超前产生，社会物质基础滞后发展的近代中国，难免失之偏颇。

考察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程度，也很难说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能以独立社会力量姿态出现的资产阶级。不容否认，当时的资本家在人数上已进一步增多，实力也有所加强，但他们彼此之间仍仅仅限于行业或乡谊等十分狭隘的联系，组织的发展程度没有什么变化。思想上尚无明确的阶级认同感，也就是说仍不具备自觉的阶级意识。因此，不能说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资本家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是与其发展状况相吻合的。由于没有形成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我们看不到各行业的资本家互相联合起来，在戊戌变法这样一次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中，集体表露自己的态度和采取统一的行动。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家的统一组织或机构，能代表整个工商业者的利益，直接表达他们的要求，领导他们参与变法运动。从整体上看，似乎工商业者对戊戌变法并未予以多大的关注，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行动，

只有少数资本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一些变法活动。而在20世纪以后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中，工商业者却无不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互相协调配合，公开表明其政治态度，并采取相应的统一行动。从这一重要侧面，即可看出戊戌时期的资本家尚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戊戌变法以前，投资于商办新式企业的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基本上没有脱离原来买办、地主和官僚的地位与立场，只是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化。所以，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增长；资本家数量相应增加；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跃上了政治舞台。此时，作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才真正形成。^①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第三种意见从四个方面作了论述，是目前论述资产阶级形成最全面的一种观点，视野和角度较前均有拓展，不仅涉及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直接考察了资产阶级主体的自身发展态势，因而更具说服力，得到多数学者的首肯。目前，大部分近代史教材和有关著作都采用了这一观点。如果说仍稍有不足，那就是对资产阶级主体的考察尚欠充分，特别是未从资产阶级的组织发展和思想意识方面进行分析。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间界定，似乎也过于宽泛。

1983年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曾就资产阶级何时形成进行过讨论，但意见颇为分歧。有的学者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从19世纪

^①林增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70—80年代开始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也有人认为，经济是一个复杂、相对的因素，很难用工厂或基本的数字来判断资产阶级在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形成。而政治斗争则有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因此在各种因素中可以着重考虑政治因素，发生维新运动的19世纪90年代，即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形成时期。还有的强调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后来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起点应是19世纪40年代，完全形成则是在19世纪末。^①

以上说法因系在发言中提出，大多论证不充分，也欠严密。同时，由于缺乏一个准确而统一的标准，论者之间有的强调经济因素，有的侧重政治因素，其结果必然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综合以上介绍的各种意见，不难看出学术界对资产阶级何时形成这一问题的探讨非常活跃。尽管尚未获致完全统一的认识，却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启迪。但是也应看到，以往的探讨在视野上仍嫌狭窄，有一定局限性。我认为，目前应着重加强对资产阶级本身发展状况的考察，尤其是探讨其组织发展程度和思想意识的变化。这样，或许能够对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获得比较清晰的认识。

二 资产阶级组织程度的提高

所谓阶级，应该是一个社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相同的地位，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彼此之间必须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成为协调行动的一股社会政治

^①参见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力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彼此孤立，单独相向的状态是不可能形成一个阶级的，马克思在分析法国中世纪的小农时就曾指出：“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①不难看出，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这也是考察资产阶级是否形成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自发分散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有组织程度有所增强，通过某种枢纽性的组织机构，才能凝聚联结成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任何一个阶级，也只有在组织起来之后，才能从事最起码的社会活动，体现出本阶级的政治能量，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它的存在与影响。据此，笔者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资本家社团组织——商会的建立，可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

商会成立之前，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公所、会馆等组织机构，但其性质类似于中世纪的行会，与近代的商会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知道，传统的公所、会馆一般是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各行业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而建立的一种非常狭隘的机构，商会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增强的产物。在成员构成上，公所多由同行业者联合而成，会馆更兼有同乡会的色彩，由在异乡的同籍者组成。因此，会馆无行业之分，但有地域的限制，公所无地域限制，却有行业帮派之别，均非各行业资本家的统一机构。被誉为“众商业之代表”的商会，则不限籍贯和行业，是联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其产生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分散在各行业的资本家凝聚成了一个相

^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对统一的整体。从活动内容看，公所、会馆往往各有其势力范围，畛域分明，壁垒森严，除约束会员，限制竞争外，还从事联络乡谊和慈善事业。商会则是各行业的枢纽性机构，其活动范围不限于某一行业，它的宗旨是“联络群情，开通民智，提倡激励与兴利除弊，并调息各业纷争”^①。

清朝商部颁行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垣及通商大埠成立商务总会，府州县设立商务分会，贸易较为发达的集镇则设立商务分所，就此表象而论可以说商会只是一个更广阔范围内的区域性组织。然而透过这一表象，却可发现各商务总会通过星罗棋布的分会和分所，层层联结与渗透，实际上形成了网罗全省各地资本家的轴心，发挥着某种系统中枢的重要作用，从而改变了各省区资本家过去那种互不联系的分散孤立状况。

如从全国范围看，各省的商务总会也互不统属，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因之毫无联系，恰恰相反，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商会在各项实践活动中往往遥相呼应，密切配合而协调行动。通过这种紧密的联系，则又使全国的资产阶级也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由此得以产生商会“登高一呼，众山皆应之势”^②。1905年爆发的反美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涨声势和普及程度，即是上海商务总会率先以“伸国权而保商利”相号召，各地商会闻风响应，积极动员资本家踊跃参加这一爱国运动的结果。1907年的讨论商法草案大会，也反映了全国各商会之间的紧密协同关系。据有关文献记载，派代表赴上海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88个商务总会、分会和分所，其中包括新加坡、三宝瓏、长崎、海参威海商总会。另以书信形式与议者，还有30余埠。这次有领导、有组织、

①《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2期。

②《大公报》1905年7月2日。

有明确宗旨的全国性民间商业立法活动，展示了资产阶级政治上要求民主体利、经济上发展自身利益的双重愿望，也说明全国各商会趋向一致、联合行动的发展态势。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筹办华商联合会和中国华商银行的动议，会后又派人专程赴南洋从事联络。1909年12月，海内外商会代表第二次聚集上海召开商法讨论会，决定将上海商会创办的《华商联合报》改名为《华商联合会报》，报馆内附设华商联合会办事处，负责联络筹备工作。此后，该办事处即成为全国各商会的联络中心，它除通过《华商联合会报》进行宣传鼓动外，还组织各地商会共同从事了不少的经济政治活动，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商会间的联系。

1910年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前夕，华商联合会办事处为动员和组织海内外华商参加这一政治运动，即在会报刊发《为国会事公告海内外华商联合请求书》，各地商会马上积极响应，“或即开会，或拟上书，或任运动同志，或拟公举代表”，造成国会请愿运动的广泛声势^①。上述事实表明，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不仅依靠自己的这一组织在地方上团聚起本阶级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分散自发的狭隘落后状态，而且通过相互之间的照应和协调运动，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省区的界限，在全国建立起虽比较松散但却令人瞩目的政治经济网络，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清末的上海，设有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管理市政建设。在这个机构中，虽有不少地方绅董，但领导权基本上控制在商会领导人手中。总工程师局总董李平书，是沪南商务分会的会董，办事总董

①《记国会请愿代表进行之状况》，《东方杂志》第7年，第2期。

曾铸、郁屏翰、朱葆三等三人均为上海商务总会的骨干。1909年总工程师改组为自治公所，李平书连任总董，中区商团团长莫锡纶当选为副总董。董事王一亭、叶遑、苏本炎、朱得传、顾履桂等都具有商会会董或会员的身份。^①以商会领导人为骨干而组成的总工程师及自治公所，在改变上海城市面貌等方面从事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招商建立电灯有限公司、创办自来水公司、增辟城门马路等。此外，总工程师还设有参事会，下分户政、警政、工政三科，并办有政法讲习所，附设裁判所、平果局、平价处等，比较全面地管理城市社会生活，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还应该强调的是，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组织机构，从此他们不再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势力相周旋。如商事裁判权以前控制在官府衙门手中，工商业者每逢涉讼纠纷，必受敲诈勒索。由于势单力薄，各商家虽无不怨声载道，却无可奈何。商会的成立就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不少商会附设商事公断处或裁判所，“以保商规、息商累为宗旨”^②，并向官府明确宣布，嗣后“凡商号一切诉讼案件，概归商会办理”。这样，工商户“遇有亏倒情事，到会申诉，朝发夕行，不受差役需索之苛，并无案牍羁留之累，各商藉资保护，受益良非浅鲜”^③。又如1906年底，江苏地方衙门增收牙贴税，商人苦不堪言，于是苏州商务总会及所属部分分会多次呈文交涉，要求商部出面制止。最后商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宣布暂停加征。可见由于有了商会这一联系纽带和基地，封建统治者对资产阶级的气度和活动能

①《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123、1125页。

②《保定商会设所裁判讼案》，《华商联合报》第8期。

③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68卷，第48页。

量也须刮目相看了。

综上所述，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相继建立，当可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界标。它将资产者以往的个人或行帮形象，转变为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从而使其得以极为活跃的政治风貌在晚清风云变幻的社会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活剧。

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仍处于幼年时期，尽管其组织程度明显加强，但在许多方面依然远未完全成熟。就商会这一资产阶级的新式社团而言，其性质与旧的公所、会馆有着本质的不同，却又“大都以各业公所、各客帮为根据”。商会的会员，也就是各行帮所推选的商董，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从实际情况看，商会成立之后，公所、会馆并未即刻消亡，有的行业甚至继续增加。据民国7年刻本《上海县续志》记载，清末的上海约有会馆、公所73个，其中建于光绪、宣统年间的即有水果、参业、金业、纱业等37所。这一方面是公所、会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某些变化，旧的封建色彩有所削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表达工商业者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反映资产阶级虽然有了自己统一的社团组织，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受到传统行帮格局的某种限制。因此，清末商会的诞生，只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初步形成。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全国性的资产阶级联合团体正式宣告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

三 资产阶级近代意识的增强 •

考察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不仅应该分析其组织程度的增强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还要探讨当时的资产阶级自身是否已具备近代思想意识。因为一个阶级在其成员具有共同的阶级利

益意识时，才能称得上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阶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普逊即曾说明：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无论是继承的还是分享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才会发生。^①应该指出，汤普逊这段话强调的仅仅是阶级意识，而且主要是针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言的。我们认为，从思想意识方面，考察处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特殊社会历史土壤中的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形成，不能局限于阶级意识这一个方面，应该从更大的范围来观照包括它们的阶级意识在内的近代思想意识。商会诞生之时际，资产阶级已萌发了明显的近代意识，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资产阶级已初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

资产阶级近代意识的明显萌生，首先体现于其具有丰富近代内容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早在秦汉时期汉族即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与文化，因此，中国人民的祖国观念、民族意识、民族感情产生已久，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但是，祖国和民族都是历史的范畴。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祖国和民族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有着相异的内涵。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包含着近代民族、国家、国民等新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故而明显不同于古代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历史范畴。

与古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囿于一隅小国或者是眷恋于汉族复兴相对照，20世纪初资产阶级所萌发的近代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将中国看作各民族统一完整的国家，并且意识到“国家为人民之集合体”^②，而不是视为某个王朝体系世代相袭的天下。

①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纽约1966年版。

②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297卷，第36页。